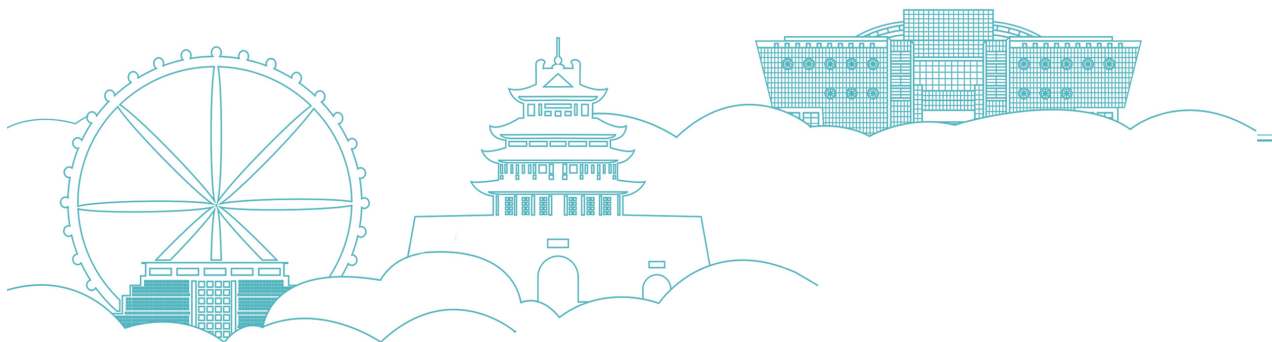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打造法治文化传播的鲜活载体

■ 徐民 崔淑静 郝凯 于杰

法治文化建设,既需要制度规范的刚性约束,也需要文化滋养的持久力量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,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治理智慧,如何让这些文化资源走进当代法治实践,是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需要回答的重要课题。历史人物是一个鲜活切口——相较于抽象的法治概念,他们有经历、有故事、有选择,其精神能让价值理念可感可知,更易转化为社会认同。

以人弘法,首先要从历史人物的精神与实践提炼法治价值。人物精神不能简单当作“法治符号”,更不能用今天的法治概念机械套用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实践,而应尊重历史事实,在人物生平、治理实践和思想主张中寻找与现代法治文化相契合的价值元素。聊城历史文化中,伊尹与马周提供了两个不同的观察切口。伊尹与有莘文化关系密切,《尚书·伊训》记载其提出“制官刑”,告诫官员警惕“三风十愆”,反映出早期政治治理对官员行为的约束和政治秩序的维护;马周

为博州茌平人,《新唐书》载其曾任监察御史,奉使称职,《贞观政要》记其“处事平允”“直道而言”,其政治实践为考察古代监察、谏诤与公正治理提供了具体切口。对这些人物的研究,应从历史事实中提炼规则、责任、公正等价值元素,为当代法治文化提供有益滋养。

以人弘法,关键在于实现人物精神的当代表达。对聊城历史人物资源进行研究阐释与转化利用,应坚持历史真实与时代价值相统一,把人物故事转化为群众能够理解的法治语言,把文化记忆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认同。通过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,挖掘民为邦本、礼法并用、明德慎罚、执法如山等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,根据时代精神加以转化,并加强对代表性人物事迹和精神的弘扬。

以人弘法,落脚点在于让文化认同转化为法治实践。法治文化建设的目的是,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社会生活的一种自觉。人物精神传播不能止于展陈、宣讲和媒体报道,还应融入校园教育、社区治理、企业合规等场景。以人物

故事讲规则意识,以人物实践讲责任担当,以精神认同增进法治认同,使抽象的法治理念有具体的人物参照、鲜活的生活场景,拉近法治与群众的距离。对聊城而言,可依托“两河”文化资源和现有法治文化阵地,加强人物精神的研究阐释、内容转化和场景应用,推动文化资源从“可讲述”走向“可认同”、从“可传播”走向“可践行”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“以人弘法”是依托历史人物,探索文化资源转化为法治力量的一条路径。其基本逻辑是:从人物实践中提炼价值,从文化价值中寻找法治契合点,从法治价值中寻找现实应用场景。传播是桥梁,认同是纽带,实践是落点。推动聊城两河流域人物精神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应在守住历史真实底线的基础上,加强研究阐释和当代表达,让人物精神从文化记忆中的“过去时”,成为法治文化建设中的“进行时”,为基层法治实践注入更加深厚的文化力量。

(2026年度聊城市社科规划“习近平法治思想与法治聊城实践研究”专项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,课题编号:ZXKT2026400)

AIGC在聊城“两河”文化传播中的应用研究

■ 郭斌 刘文康 李太斗

“两河”文化是黄河文化与运河文化交汇融合形成的文化形态,农耕文明的厚重与商业文明的开放,塑造了聊城独特的文化生态。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两大国家战略的推进,“两河”文化保护传承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,但从传播视角看仍有短板:民间故事传说散落各处,未能形成可传播的故事体系;非遗宣传多停留在展板、纪录片和节庆展演,缺少符合当代语境的表达,叙事宏大脉络而轻个体命运,对具体的人、家庭、商帮故事挖掘不足,难以引发情感共鸣。这些短板,深层原因是传媒产业力量介入不足,传播链条缺乏从资源到产品的高性价比转换方法。生成式人工智能(AIGC)的快速成熟,为破解这一困境提供了技术可能。

首先,以故事素材库推动文化资源叙事重构。传统故事采集依赖人工整理,周期长、成本高,成果多为文字保存,难以适应当下传播规律。AIGC可借助自然语言处理与知识图谱技术,对地方志、碑刻、口述史进行语义分析,关联人物、地点与事件,建立可供创作调用的故事素材

库。以聊城为例,临清钞关的税收故事、聊城商帮的奇闻轶事等,长期散落于地方文献与口述记忆中,缺乏系统化叙事转化。AIGC为这类“沉睡素材”提供了低成本、高效率的激活路径——将其制作成短剧、音频连续剧、图文故事,使文化叙事从“资料汇编”变为有人文温度的沉浸式体验。

其次,以记录转译推动非遗资源持续再生产。传统非遗传播多停留于展板、纪录片和节庆展演,资料虽被保存,却难以调用和二次创作。AIGC应推动非遗从“记录”走向“转译”:对工艺流程、纹样符号、声腔节奏进行语义标注,形成可调用、可重组的结构化素材,使一次采集服务于多平台、互动化的持续传播。聊城拥有东昌葫芦雕刻、阿胶制作等丰富的非遗资源,虽已采集大量影像资料,但多以“观看”为终点,缺乏面向AIGC调用的语义标注和结构化处理,只能完成单次传播,难以重复利用,无法适应多平台、互动化、持续再生产的传播需求。

当前,中国非遗数字化的前沿实践正在打通这一环节:“楚镜AI”通过纹样拆解、编号与矢量

化建设数据库,支持用户再创作;黄梅戏AIGC微短剧《打猪草》以数字场景承载方言、采茶调等非遗元素;《三星堆·未来启示录》探索文化遗产与科幻叙事的结合。这些案例的共同启示,是以当代视听语言转译传统文化,在保留文化特征的基础上拓展表达形式。聊城本土AI推荐官“聊小优”正是这一逻辑的落地实践。其系列短视频遵循“记录—转译”的完整链条:前期系统采集非遗资源,再分类转化为结构化素材,最终以年轻人乐于接受的形式重新组编输出,实现从静态档案到可调用叙事资源的转化。

技术应用必须尊重文化传播的边界。AIGC可以降低文化接触门槛,不能降低文化品位;可以简化表达形式,不能削弱文化内涵。内容生产应以文史研究和可靠资料为依据,避免炫技掩盖文化价值。AIGC应成为文化的“翻译者”和“放大器”,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知的故事,而不能替代学者的研究判断。

(2026年度聊城市社科规划专项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,课题编号:ZXKT2026201)

孔繁森精神融入高中思政教育浅谈

■ 武良凯

高中是青少年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形成的“拔节孕穗期”,思政教育直接关系青年理想信念塑造。传统单向灌输式教学已难以适配高中生认知特征,需要挖掘富有感染力的红色资源赋能课堂教学。聊城是孔繁森的故乡,拥有孔繁森同志纪念馆等红色阵地。把孔繁森精神融入高中思政教育,可依托本土文化,帮助学生完成从理论认知到情感认同、再到行动自觉的转变,对化解思政课理论抽象、内容疏离、实践碎片化等问题,具有理论与现实双重意义。

孔繁森精神与高中思政教育的契合体现在价值、内容、实践三个维度。

理想信念培育的价值契合。高中思政教育旨在引导学生坚定信仰信念,听党话、跟党走。孔繁森两离桑梓、奉献高原的人生抉择,让“对党忠诚”成为鲜活案例,帮助学生感悟理想信念力量,推动个人理想融入民族复兴事业,契合筑牢理想信念之基的教学目标。

教学内容的契合。孔繁森精神能对接各模块知识点:《政治与法治》中,其为民事迹具象化诠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;

《哲学与文化》中,他的奋斗经历是“在劳动奉献、个人与社会统一中实现人生价值”的生动素材;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》中,其开拓作风帮助学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。以此弥合理论与现实的鸿沟,让课本知识可信可感。

核心素养落地的实践契合。孔繁森精神诞生于实地干事备番,具有鲜明的实践性,契合思政课理论联系实际原则,能改变课堂重识记轻践行的问题,引导学生以榜样为参照,在志愿服务、社会调研中提升公共参与能力,实现知、情、意、行统一。

依托聊城红色资源,结合高中生认知特点,可构建四位一体融合育人体系,推动孔繁森精神融入高中思政教育。

课堂主阵地渗透式融入。发挥思政课堂主渠道作用,结合课程模块开发案例。讲解党的宗旨时运用孔繁森为民故事,借助情景再现、小组研讨、主题演讲替代单向灌输。开发《孔繁森精神与青年成长》校本选修课,编写通俗读本,联结榜样事迹与青年时代责任,激发学生情感共鸣。

红色场景沉浸式体验,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堂。以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作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,开展研学活动。摒弃走马观花式参观,设计专题研学线路,鼓励学生担任志愿讲解员实现自我教育。邀请孔繁森生前同事、“五老”人员进校园口述历史,增强红色教育感染力。

校园文化常态化浸润,拓展第二课堂。建设校园文化长廊、主题宣传栏,开展主题征文、演讲、红色话剧展演。组建学生宣讲团,走进社区乡村讲述孔繁森故事。成立“繁森志愿服务队”,组织学生参与敬老助困、社区公益,把精神内涵落实到日常行动中,做到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。

数字技术创新赋能,建设网络思政阵地。贴合青少年网络阅读习惯,教师制作微课、短视频、H5作品,利用校园新媒体传播故事。利用VR虚拟仿真重现阿里工作场景,让学生直观体会援藏的环境艰苦。开设网络专题栏目,鼓励学生创作新媒体作品,借助网络阵地弘扬革命精神,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侵蚀。

(2026年聊城市社科规划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,课题编号:ZXKT2026364)

地域文化认同视域下“两河”故事价值浅析

■ 何德民 孙旭

聊城是黄河与大运河实质性交汇的城市,两条大河千百年奔涌交汇、共生发展,塑造了“江北水城、两河明珠”的独特风貌,也积淀了大量民间故事与人文典故。从地域文化认同视角探究“两河”故事的多元文化价值,对守护聊城文脉、凝聚市民共识、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

“两河”故事承载着聊城厚重的历史记忆,是筑牢城市文化根基的鲜活载体。黄河孕育了雄浑厚重的农耕治水文明,历代沿河民众治河防汛、垦荒安居,衍生出丰富的治黄故事与民俗传说;大运河则注入灵动开放的商贸文脉,明清时期漕运兴盛、商贾云集,催生了诸多反映通商往来、邻里相和、文脉传承的市井故事。相较于官方史料,这类故事更富生活气息,留存了聊城的地域民俗与民生百态,成为可感知、可解读、可传承的“活态地方史书”。

同时,“两河”故事是凝聚民心、强化地域文化认同的重要情感纽带。地域文化认同源于民众对家乡风土人情、历史文脉、精神气质

的深度感知与情感共鸣,而根植民间、代际传递的“两河”故事,是最贴近群众的文化传播载体。无论是老一辈治水佳话、运河旧事,还是融入校园教育、乡土宣传的人文典故,都能让民众直观感知家乡历史底蕴;对青少年与新民而言,更是认知聊城、认同聊城、归属聊城的重要窗口,可有效培育归属感与荣誉感,凝聚共建家乡的文化合力。

当前城市竞争的核心已从硬件设施转向文化软实力,独特的地域文化故事与深厚的历史底蕴,是城市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。黄河文化的厚重刚毅与运河文化的包容灵动相互交融,孕育了聊城“厚德重义、开放包容”的城市品格,“两河”故事正是这一品格的具象表达。将零散的民间故事进行系统化梳理、IP化开发与场景化应用,可助力“两河明珠”城市名片打造有故事、有底蕴、有魅力的城市形象,提升聊城的城市辨识度与文化影响力。

更为关键的是,“两河”故事蕴含宝贵的精神内核,能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丰厚滋

养。其中既有历代先民攻坚克难、人定胜天的治水奋斗精神,也有运河漕运文化兼容并蓄的开放包容精神,更饱含淳朴向善、重义守信的乡土民风,这些精神特质与新时代城市发展理念高度契合。传承“两河”故事,本质上是对本土优良人文风尚的传承,能潜移默化地提升市民素养,涵养城市文明气质。在城市化快速推进与新媒体浪潮冲击下,诸多小众民间故事面临失传、边缘化困境,对“两河”故事进行深度整理、活化传承,是守护城市文化根脉、激活乡土发展活力的必然选择。

在文旅融合背景下,“两河”故事更是推动聊城文旅产业提质升级的核心内容。以“两河”故事串联河湖风光、民俗非遗、人文古迹,打造“景色承载文化、故事赋能风景”的沉浸式文旅模式,能够推动文旅资源开发从“景观展示”向“文化体验”转型,提升聊城文旅产业的内涵质感与核心吸引力。

(2026年聊城市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,课题编号:ZXKT2026211)

乡村振兴,既要塑形,也要铸魂。教育振兴是文化振兴的关键点,承担着培育人才、传承文化、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多重使命。然而,当前乡村教育依然面临师资力量薄弱、优质教学资源供给不足、城乡发展不均衡等现实难题。要解决这一难题,离不开本土精神文化资源的挖掘利用。诞生于聊城市冠县的近代平民教育家武训,三十余年行乞劳作、倾尽积蓄创办崇贤义塾等三处义学,为贫寒子弟争取受教育机会,其凝结而成的“武训精神”,跨越百年仍闪耀着崇文重教、无私奉献的光芒,是赋能乡村教育振兴的宝贵本土资源。

“武训精神”的内核可以概括为四层要义:坚韧不拔的奋斗意志,数十年历经磨难矢志兴学、百折不挠;无私奉献的公益情怀,克己忘我,把全部劳动所得投入兴学事业;兴学为民的教育理想,追求教育普惠,打破底层民众受教育的壁垒;公私分明的实干品格,办学财物专款专用,恪守民间公益的诚信底线。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,与新时代推动教育优质均衡、促进乡村振兴的目标同频共振,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。

但从实践看,武训精神的传承赋能仍面临现实困境。部分校园传播停留在讲述故事、张贴画像层面,历史内涵与当代价值衔接不足,难以入脑入心;传承多靠学校单方面推动,政府、社会、家庭协同联动不够;传播方式仍以纪念馆参观、校本教材等传统形式为主,面向青年群体的短视频、数字文创等新媒体供给不足;效果评价多为定性描述,缺乏科学的指标体系;部分乡村学校师资紧张、条件有限,也制约了精神传承落地见效。

推动武训精神赋能乡村教育,需要构建政府引导、社会协同、学校主阵地、家庭参与、教师践行的“五位一体”模式。政府应当做好顶层制度设计,把武训精神传承纳入县域文化与教育发展规划,用好武训纪念馆等研学阵地,深化馆校合作,依托公益基金会搭建平台,引导乡贤、本土企业参与助学兴教,配套落实校本教研、经费保障,推动传统民间助学智慧转化为教育资源体系。社会层面要活化线下文化活动,借助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崇文重教主题宣讲,搭建数字叙事资源库,开发短视频、研学课程等多元化产品,促进文旅资源向教育资源转化。学校作为育人主阵地,要依据学段特点推动武训精神进课堂,将其融入语文、历史、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学,开发校本课程,组织实地研学,同时把无私奉献、扎根基层的精神融入师德师风建设。家庭同样不能缺位,依托家长学校开展家校共育,将崇文重教、艰苦奋斗融入家风建设,打通家校育人壁垒。教师层面,要将武训精神纳入教师教育培训,鼓励教师挖掘乡土教学素材,同时完善乡村教师激励保障机制,守护好乡村教育讲台。

传承弘扬武训精神,不是简单复述历史故事,更不能照搬晚清行乞办学的模式,而要坚守守正创新,剥离时代局限,萃取精神内核,使其与立德树入、教育公平的当代理念相结合。以武训故里为样本,构建多维评价体系,总结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,方能以百年薪火照亮乡村教育振兴之路,为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注入深厚的本土文化动力。

(2026年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,课题编号:ZXKT2026278)

聊城汉画像石中“孔子见老子”图像考略

■ 李燕

汉画像石是汉代雕刻于墓室、墓阙、祠堂等建筑构件的装饰性石刻,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,发现数量以山东省为最多。聊城市目前有东阿、阳谷、东昌府区和高唐出土画像石,画像内容多涵盖生活场景、历史故事、天文星象、祥瑞瑞兽、几何纹饰等方面,其中东阿邓庙汉墓中的“孔子见老子”图像尤其引人注目。

邓庙“孔子见老子”画像位于M2中室北梁,长270厘米,宽39厘米。画面布局分为上下两层。上层有边栏三道,内有连续卷云纹和垂帐纹。下层左端有一厅堂,堂内外各有两人相对跽坐,檐上有一猴攀爬。右侧有一长者执杖躬身而立,长者前有一推轮幼童;幼童对面有一身高高大之人,怀抱一雁作躬身施礼状,其后有18人;上方空旷处有15处榜题,仅左数第5榜刻有“七十二人”四字,其余为空榜,画面空白处有2只鸟填补。

“孔子见老子”画像多见于鲁南、苏北祠堂与墓室,山东嘉祥武氏祠、吕村、齐山村、宋山村、纸坊镇敬老院以及滕州、平阴等地均有出土。有的画像中还有具体榜题,如武氏祠画像中有“孔子也”“孔子车”“老子也”;平阴画像中有“老子”“孔子”“闵子”“颜渊”。邓庙画像中虽没有确切的“孔子”“老子”榜题,但和上述诸地一样,都有孔子拱手扶掖、老子拄杖相对、二人中间有推轮幼童这三个人物形象,再结合其“七十二人”榜题,可判断内容为“孔子见老子”图像。

研究资料表明,画像石上的图像题材和表现手法都以一定的粉本为依据。邓庙画像石雕刻主要采用了减地平面线刻的技法,雕刻技法和画像内容都带有明显的吉祥风格,反映了两者背后相同的技艺和相似的图像粉本。结合同样风格的东阿罗何君祠堂石柱题记记载,画像是由山阳瑕丘和高平两地(今山东济宁一带)匠师共同完成,可以推测邓庙画像石应该也出自当时鲁南地区工匠之手。鲁南地区丰富的山体资源和画像石发源地优势,造就了一批善于雕刻的能工巧匠,他们满足了厚葬的社会需求,形成了专门制作画像石的生产作坊,为了谋生不惜远走他乡,根据画像粉本和墓主家族要求,为逝者制作画像石,在作业过程中使儒学发源地最盛行的“孔子见老子”画像出现于百里之外的鲁西地区。

“孔子见老子”画像,是西汉时期儒道两家思想相遇、对话与交融的历史见证。画面中孔子躬身拱手,姿态谦卑地向老子施礼请教,彰显了先秦士人虚心好学、温良谦让的品格;画面中加入七岁为孔子师的神童项童,表达“圣人无常师”的思想,无论老幼,有德行学记即可为师,宣扬尊师和向一切贤者学习的儒家价值观。此画像出现于邓庙汉画像石中,是墓主家族主动选择的结果,说明家族崇尚儒学、讲求礼义,希望以此教化子孙后代。同时,“孔子见老子”画像也表明在儒学为尊的两汉时期,政治上用儒家纲常伦理治理社会的同时,民间也广泛吸收道家等其他流派的思想。

(2026年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,课题编号:ZXKT2026172)